

吉拉斯“异端”思想的发展历程

孔寒冰 项佐涛

内容提要 米洛万·吉拉斯因其思想的尖锐性、活动时间之长、影响力之大成为二战后苏东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公认代表。他从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到“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发展历程,展示了苏东国家中那个特定年代的“异端”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状况,也展现了整个 20 世纪苏东国家的政治思潮变动的脉络。因此,梳理和分析吉拉斯的思想变化,对于了解东欧的“异端”思潮,以及二战后苏东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吉拉斯 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 新阶级 苏东国家

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过这样的话:“在极权媚俗的国家,一切答案都早已预先设定,疑问则被预先排除。因此,对极权媚俗的真正对抗者就是那个发出疑问的人。疑问就像裁开舞台布景的彩幕的一把利刃,让人看见隐藏在它背后的东西。”^①战后实行苏联模式的东欧就是这样的国家,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成为对这种模式最早发问的人。他们认为苏联模式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而且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种种问题的根源。铁托的战友、前南斯拉夫副总统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旧译德热拉斯、杰拉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更加尖刻的批判,甚至走向了极端。他在指出苏联模式种种弊端的同时,还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内部的特权阶层正在统治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的年代里,吉拉斯的观点被西方国家大肆吹捧,并被恶意地用来

*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① Milan Kundera,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Harper & Row, 1984, p. 254.

攻击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人甚至认为,“新阶级”理论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① 吉拉斯也因此一度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理论的巨大影响力,西方学者对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或着重吉拉斯思想的某个方面,或着重他思想发展的某一个或几个阶段,而没有从整体上全面地展现吉拉斯的思想发展历程。吉拉斯在提出“新阶级”理论前后的思想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吉拉斯及其“新阶级”理论,了解苏东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② 运动,认识东欧社会发展的曲折性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斯大林主义者”

在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与真诚的共产党员一样,也曾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他们为了改变本国落后挨打、受剥削和受压迫的状况,毅然投身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流血牺牲。在二战之前,苏联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样板,因此,对当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来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就是为建立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吉拉斯也不例外。

1911 年 6 月 12 日,吉拉斯出生在黑山(Montenegro)。在巴尔干半岛上,黑山人素以对自由的执著追求和忠诚善战著称,他们认为“黑山以外没有自由”。吉拉斯家族是典型的黑山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抵抗土耳其人的英雄;他的父亲,作为黑山第一代受教育的军事领导人,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奥地利人、土耳其人作过战。因此,对于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地区度过童年的吉拉斯来说,为自由而战、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而战,便成为他从小就具有的英雄主义情结。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便为吉拉斯提供了一种建立美好社会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将消除不公正、苦难和不幸。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胜利已经从俄国开始了,俄国代表了未来的希望。它领导下的世界共产党肩负着历史赋予的把世界从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使命。正是这种明确的愿景和真正的文学天赋使吉拉斯成为党的主要宣传者。”^③

① 转引自何宝骥主编:《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通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9 页。

② “持不同政见者”主要用来指反对所在国政府的政策、法律和执政者的合法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或政客。与“反对派”不同,“持不同政见者”所持的观点不被当局或主流观念所容忍,因此,他们往往成为政治打击的对象。在苏东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苏联模式的坚决的反对者。

③ Joshua Muravichik, “The Intellectual Odyssey of Milovan Djilas”, *World Affairs*, No. 4, 1983, p. 325.

1929 年,吉拉斯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南斯拉夫文学,^①很快就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青年;1932 年加入南共并担任了贝尔格莱德大学党组织的书记,1938 年成为铁托领导下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39 年成为南共政治局委员,跻身于以铁托为首的四人领导集团。在这一时期,和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吉拉斯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把斯大林奉为神明,赞美斯大林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祖国,把苏联模式奉为社会主义的主臬。他在南斯拉夫积极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为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发表在《战斗报》(*Borba*)的题为《斯大林》的文章中,他极度颂扬斯大林和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他赞美斯大林在个人品质方面集合了人类一切的优点,摈弃了人类一切的缺点,是一个最完美的人,“斯大林是纯粹的良知的唯一代言人,他有一个无私的心。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伟大的列宁的学生和伙伴,他是工人阶级和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最好的儿子,他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于一身,他呼吸着今天人类的伟大、高贵和热爱自由的气息。”^②在吉拉斯看来,斯大林的伟大更在于他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斯大林英明地领导着伟大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欢乐和繁荣。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说教,使它们能够指引无数人的生活。他引领第一个工农国家的航船前行,这艘航船将能够经历任何暴风雨。……当今世界没有苏联将会怎样?法西斯主义的野蛮统治的黑暗。没有斯大林,太阳将会暗淡无光。”^③因此,他虔诚地号召南斯拉夫人走苏联人的道路,为在南斯拉夫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的民族开始歌唱一首简单却又富有激情的战斗之歌,一首关于伟大的斯大林的歌,一首关于我们俄国兄弟的歌,他们将从灭亡中拯救斯拉夫人,从重归野蛮的危险中拯救所有人类。”^④吉拉斯后来回忆这段思想经历时说:“对我来说,斯大林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代表了所有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革命、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所有这一切都集斯大林于一身。从这方面来说,我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没有代表任何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东西。”^⑤

然而,吉拉斯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歌颂,并不是基于亲身经历,而是对自己舍身奋斗的理想中的完美社会的描述,他在 1944 年之前并未到过苏联。但

① 国内的相关文献误为法学专业或者文学和法学专业,如徐耀新所写的《米洛万·吉拉斯》一文(《国际共运史研究》第 7 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6 页)。实际上,1929 年入学时,吉拉斯所修的只有文学专业,并且因在 1933 年被捕,未获得学位。1936 年,吉拉斯被释放后,为了组织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革命运动,曾经回校修过法学专业,但也并未获得学位。

② Milovan Djilas, “Stalin”, *Borba*, November 7, 1942.

③ Ibid.

④ Ibid.

⑤ Milovan Djilas, *Lenin on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Yugoslav Information Center, 1950.

是,像斯大林和苏联模式这样本身并不完美的事物,当与它真实地接触时,对它的迷信就会像暴露在外头的木乃伊一样,很快就风化消失了。当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真正确立起来,当吉拉斯与斯大林有了直接接触时,他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很快就消失了。

二、“铁托主义者”

冷战后,苏联模式于 40 年代末被移植到了东欧国家。^① 然而,这种从外部移植的社会主义很快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一些党员和群众中苏联的神话开始受到了质疑,而这方面南斯拉夫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与苏联经历了短暂的蜜月后,南斯拉夫最终与苏联决裂,成为东欧国家中苏联模式的第一个挑战者。^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吉拉斯也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成了一个“铁托主义者”。

访苏的亲身经历和苏联红军在南斯拉夫的一些野蛮行为,使吉拉斯对“社会主义的第一国度感到失望”。1945 年秋,苏联红军进驻贝尔格莱德后,吉拉斯就听说了有关红军的负面报道,“他们逮捕反抗者,监视我们的官员,他们的强抢豪掠……那天深夜,这些惨不忍睹的场景和苏联红军扭曲的思想使我彻夜难眠。我们痛苦,我们怀疑:红军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也不应该是这样。一切值得敬佩和回忆的事情都逐渐消失了。”因为,这批红军生长在社会主义环境里,是社会主义培养的“新人类”,他们代表着整个苏联社会的形象。^③ 由于他抗议红军的言词过于激烈,惹恼了斯大林,以至于铁托亲自带他到莫斯科谢罪,期望能够消除他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这是吉拉斯第二次访问苏联。他 1944 年第一次访苏时,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使他“迷恋”,但这次访苏,他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苏联的状况了,“我对苏联的实际情况了解得越深入,我的疑虑就越多。要使我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和这些事实相妥协,就越来越成为非常困难的事了。”^④ 但是,他对苏联存在社会问题还是持理解的态度,认为苏联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落后的历史背景使它不免会受一些残余的落后因素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就实现人类所有的梦想。^⑤ 到 1948 年初,当吉拉斯第三次访问苏联时,他对苏联的态度变得更为尖刻,他反问自己:“我难道还是四年前怀着忠诚、坦率、纯洁无限向往着苏联的那个我吗?在接触了现实之后,我的又一个理想破灭了。这是否是为了一场新梦的开

① 关于这一过程,可参见王瑜:《斯大林模式在东欧的推行》,北京大学 1999 年博士论文。

② 关于苏南冲突,可参见沈志华编著:《斯大林与铁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Milovan Djilas, *Wartim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pp. 416—420.

④ [南]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赵洵、林英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7 页。

⑤ Milovan Djilas, *The Fall of the New Class*, Alfred A. Knopf, Inc., 1998, pp. 13—15, 28—60.

始呢?”^①不久,苏南两国爆发激烈冲突,吉拉斯坚决支持铁托抵抗苏联的政策,成为一名坚定的“铁托主义者”。

作为“铁托主义者”的吉拉斯,其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批判苏联模式和探索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

吉拉斯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是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开始的。1949 年 5 月,吉拉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言词激烈地谴责苏联的大国主义行径,坚决捍卫南斯拉夫的主权,维护南斯拉夫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1949 年 9 月,他撰写了《列宁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一文,认为根据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如今苏联对东欧国家采取的霸权政策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主权,背叛了列宁主义。他提出应当从理论上探讨苏联在东欧国家所采取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就是理论探讨的出发点。^② 这篇文章标志着吉拉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苏联社会问题的开始,也是南共最早对苏联“修正主义”实行正面进攻的论文之一。

1950 年后,吉拉斯开始从苏共的官僚主义的角度探讨苏联模式的弊端,认为苏共的官僚主义正是内外政策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

首先,吉拉斯认为苏共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在社会主义本身范围和框架内产生的一种新现象”,是苏联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规律性现象”。^③ 在 1950 年撰写的《论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中,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财产的国有化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等新的社会关系已经在苏联建立,苏联的社会关系“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异化现象”。同时,由于苏联是在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不能胜任社会管理的职能”,而只能把社会的管理权交给官僚,这就使得“官僚统治的趋势”又成为“一种规律现象”。^④

其次,吉拉斯认为,苏联的官僚不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是一个“特权阶层”。在《论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中,他区分了“官僚”的本质与“阶级”的本质的不同。“虽然官僚与‘阶级’相似,但它与剥削阶级还不能等同。众所周知,官僚最重要的特征是管理方式。它与‘阶级’的基本区别是官僚试图创造的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拥有特权的个人基于经济基础而在经济活动中拥有一个确定职位,他

① 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第 150 页。

② Cf., Milovan Djilas, *Lenin on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③ Milovan Djilas, *On New Roads of Socialism*, Jugoslovenska Knjiga, 1950, p. 14.

④ Ibid., pp. 12—14.

们自发地承担对直接生产者的管理‘权利’，拥有在同后者关系中的特权地位。”^①到了 1951 年，吉拉斯开始用“特权阶层”(caste)这个术语称呼苏共的官僚。“特权阶层”虽然不是一个“阶级”，却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的堡垒，具有先前所有阶级的最坏的特征。^②1952 年，吉拉斯以清晰的逻辑阐明了苏联的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原因。在 4 月发表的《阶级还是特权阶层》^③一文中，他认为，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个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阶级，即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它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和国有的，官僚特权集团并不拥有它们；另外，官僚职位不是世袭的。因此，苏联的官僚特权集团与阶级有着根本区别，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特权阶层”。^④

再次，吉拉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早在 1950 年，吉拉斯就提出，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是自发的，“是一种无政府的、自发的进程”。这种自发性源于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落后，同时也将会随着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而消失。^⑤1952 年，他从理论上更深刻地证明了南斯拉夫反官僚主义斗争胜利的必然性，“因为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趋势，所以反官僚的斗争是革命的和进步的，并且必将胜利”，否则“如果官僚是一个新阶级，它的胜利将是不可阻止的；因为它由客观社会进程产生，将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如果我们正在对付一个阶级，新阶级，而不是特权阶层，那么反官僚的斗争将是徒劳的和乌托邦的，我们这些斗争的人将是反动的角色。”吉拉斯接着说，虽然“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危险是一个总的规律”，但“官僚主义的胜利则不然”。^⑥为了加速南共去斯大林化的进程，吉拉斯积极推进南共改革，成为南共党政分开、党内权力分散和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南共六大通过了改组南共、并将南共改名为南共联盟的决议。对此，吉拉斯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变化，而是党的任务及其组织原则的改变。党应当从一个发号施令的党转变为一个教育的党，其主要职责也相应地应该从直接干预国家

① Milovan Djilas, *On New Roads of Socialism*, Jugoslovenska Knjiga, 1950, pp. 19—20.

② Milovan Djilas, "The Brutality of the Bureaucracy", in Michael Milenkovich and Deborah Milenkovich, eds., *Part of a Lifetime*,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Inc., 1975, p. 172.

③ 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卢斯迪格在《托洛茨基与吉拉斯》(Michael M. Lustig, *Trotsky and Djilas: Critics of Communist Bureaucracy*, Greenwood Press, 1989)中认为是 1950 年 4 月 6 日，麦克唐纳在他的博士论文《吉拉斯政治思想的主题》(John William McDonald, *Political Themes in the Thought of Milovan Djilas*,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中认为是 1952 年 4 月 6 日。卢斯迪格的书是其 1985 年的博士论文，其中大部分内容与麦克唐纳的论文雷同，疑似抄袭。吉拉斯本人也没有提到过 1950 年写过这篇文章，而只提 1952 年发表了《阶级还是特权阶层》(Milovan Djilas, *Rise and Fall*,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6, pp. 286—287)。因此，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应是 1952 年。

④ Milovan Djilas, "Klāsa ili kāsta", *Borba*, April 6, 1952.

⑤ Milovan Djilas, *On New Roads of Socialism*, p. 14.

⑥ Milovan Djilas, "Klāsa ili kāsta".

的政治、经济生活转为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①

正因为吉拉斯在反苏问题上的坚决立场和在南斯拉夫改革方面的杰出表现,吉拉斯在 1953 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成为南斯拉夫最年轻的副总统,同年年底又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当时西方国家甚至盛传吉拉斯将成为铁托的继承人。然而,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吉拉斯的命运同整个苏东国家一样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三、“吉拉斯主义”

斯大林去世后,出于内外政策调整的需要,苏联开始改变对南政策,承认南共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权利及其取得的成就。而对铁托来说,尽管苏联模式有许多问题,但是,苏联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与苏联搞好关系非常重要。同时,他意识到,在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对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奉行“不结盟”的落后国家来说,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和一个强大的党是十分必要的。1953 年,南共联盟六届二中全会上,铁托开始改变先前“削弱”南共的做法,提出要加强南共联盟的组织建设,整顿南共联盟内部由于改革而出现的思想自由化倾向。吉拉斯对此强烈不满,认为南共改革可能功亏一篑,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有重新回到苏联模式的危险,他决心要把南共改革进行到底。^②他在 1953 年底至 1954 年初写了大量文章^③,继续探讨南共去斯大林化的道路。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吉拉斯认为南斯拉夫的反社会主义力量主要来自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尽管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但官僚主义是最主要的威胁。它是一种新型的力量,它产生于社会主义本身,“出于社会主义现实目的而每天都出现的力量”。官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反对力量,势力强大,破坏力强,现在已经影响到各现存的社会主义组织机构。^④

吉拉斯为南共开出的克服官僚主义的良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形式确实存在,而且确实从现实中发展起来的时候,它们就渗透了群众的自觉和群众的习惯,成为一种既反资本主义又反对官僚制度的真正保证。”^⑤吉拉斯的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特征是:第一,民主应是“人人有份”的民主。“主张一视同仁的民主,对于信奉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似乎是最简单最自然的”,这种

① Stephen Clissold, *Djilas, the Progress of a Revolutionary*, Maurice Temple Smith, 1983, pp. 223—230.

② Cf., Milovan Djilas, *Rise and Fall*, pp. 319—325.

③ 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录在《一个教训的研究》(Milovan Djilas, *Anatomy of a Moral*, Abraham Rothberg, ed.,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9)之中。

④ Milovan Djilas, *Anatomy of a Moral*, p. 36.

⑤ Ibid., p. 67.

民主即便是对于作为个体的资产阶级也一样,在资产阶级“不以一个阶级并且不通过阶级组织行动时”,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即“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每一个资产者享有平等”。因为,当民主不再是平等的权利时,“当一个阶级,说得更准确些,一个政治运动,以它自身的利益、观念、道德和理想等代替整个社会的欲望和利益时,它就越来越没有批评精神了”,民主就只剩下躯壳了。^①显然,吉拉斯的这种民主观更接近于西方的“保护少数人”的民主观念,而与苏东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明显区别。第二,民主应当靠法律保障。“如果社会主义力量真想获得民主的话,保持和执行民主的法律就是民主力量所必须争取的具体形式。”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党的行为也不例外。“法治系统以外的任何司法行为,如不执行判决,歪曲法律,不依法安排职业、发放奖金、安置住所等,都是武断地行使权力——以政治因素支配法治和社会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最大威胁。”他指出,法律以外的判决纵然是公正的和善意的,也总是为“武断地行使权力”提供机会,“党的公正”也不例外,“如果同时存在两种公正和两种公民,我们将永远得不到社会主义和民主。”^②苏东国家后来的政治实践表明,正是由于缺少吉拉斯所提倡的这种“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才产生了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领袖个人专断现象。第三,民主需要自由讨论得来。民主的气氛“无疑只能通过自由讨论而获得”。社会主义的自由讨论的方式要遵循“社会主义内部自由、坚持原则、坦率和同志友爱这类的方法”,尽管也有所争执,但这与资产阶级的为了个人利益所发生的争执和冲突有着本质不同,它是“生机勃勃的”。^③社会主义的自由讨论要尊重“新思想”,尽管它最初“只是少数人”的。吉拉斯认为,“只有在思想的自由斗争中,我们才可能在不引起巨大社会变动的前提下,看出在我们的国家中,哪些思想和概念是旧的,哪些思想是新的和更重要的,哪些是有效的生活方式。”他深信,“真理只有在实际斗争的经验中才能发现。斗争越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就越拥有真正的和新生的民主关系。”^④

为了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吉拉斯认为,必须继续推进南共改革,而不是“开倒车”。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也就过时了,“革命的形式一旦终止,民主一旦开始,不论是在何处,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必然过时。”^⑤1953年11月12日,吉拉斯为《战斗报》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甚至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是当代社会客观要求的唯一代表。

① Milovan Djilas, *Anatomy of a Moral*, p. 65.

② Ibid., p. 62.

③ Ibid., p. 50.

④ Ibid., p. 121.

⑤ Ibid., p. 141.

没有谁能够在要求‘掌握’生产力发展的专有权的同时,不延缓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剥夺客观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民。”^①在《联盟或党》一文中,他认为,随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社会主义的觉悟已经不再专属于共产主义者,也不再单单由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言论和著作来代表了。自从保卫国家的斗争开始后,绝大多数人民,从教师到作家、画家、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了这个觉悟。”因此,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应当是提升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独揽大权,南共联盟应当转变成为一个教育型的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标不是、也不能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者的一种抽象的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对群众进行民主教育,制定争取民主、法治和公民权等具体方法。”共产主义者联盟应当“削弱”、“萎缩”,融入社会主义联盟中,共产党员要融入公民群众中,“社会主义联盟将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真正联合体,而不再是一个自封的共产主义者的精英集团。个人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然而,这是基于个人的品质和他在群众中的作用,而不仅仅依赖于他在党委会或行政上的职位。群众的直接政治作用也将增强,人民将能够自己决定绝大多数的政治问题,而无须通过强迫的独断的领导和教条。”^②然而,“削弱”南共联盟并不等于取消南共联盟,“只要共产主义者想保存他们的组织,他们就会有自己的组织,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③

吉拉斯这种“削弱”南共联盟的思想,显然与铁托巩固南共联盟的路子完全不合拍,最终导致了他和铁托的决裂。1954 年初,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非常)集中讨论了吉拉斯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吉拉斯事件”。会上,铁托认为吉拉斯“走得太远了”,卡德尔(Edvard Kardelj)指责吉拉斯受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另一位南共理论家皮雅杰(Moša Pijade)认为吉拉斯的思想是“政治春宫图”。最终,全会取消了吉拉斯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撤销了他在联盟中的全部职位。此后,铁托宣布吉拉斯在政治上实际上已经死亡,而这种死亡“是一切死亡中最可怕的死亡”。^④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将吉拉斯的思想称为“吉拉斯主义”,表示它与“铁托主义”相对立。罢免吉拉斯后,铁托在南共联盟内部开始了清除“吉拉斯主义者”的清洗运动。

四、“新阶级”思想

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后,吉拉斯的思想走向了极端。他认为,自己的下台说明南

① Milovan Djilas, *Anatomy of a Moral*, p. 88.

② Ibid., p. 137.

③ Ibid., p. 129.

④ [南]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柯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0 页。

斯拉夫去斯大林化的努力彻底失败,其原因在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面对的是一个“新阶级”,而不仅仅是一个“特权阶层”。他决定与这个“新阶级”彻底决裂,并向世界公布这个“新阶级”的真实面目,最终结果就是 1957 年发表的《新阶级》一书。

1954 年 3 月 4 日,吉拉斯主动退出南共联盟。1955 年初,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呼吁在南斯拉夫实行多党制,并因此被判入狱 18 个月。在缓刑期间,他创作了《自由和所有权》一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新阶级》的草稿。1956 年 1 月,吉拉斯完成《斯大林模式的本质》、《今日苏联》和《当代革命》三篇文章。在《斯大林模式的本质》一文中,他指出官僚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模式中处于核心作用。他指出,权力既是官僚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的手段,同时也是苏联模式的本质。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新阶级》最后三章的初稿。1956 年春,吉拉斯创作了一篇题为《新阶级》的文章,他认为,国家所有权只不过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有权的假面具,他们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实际地占有、分配和享有国有化的财产,从而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后来,吉拉斯把这篇文章作为《新阶级》一书中最重要的一章,并以该章目命名全书。1956 年夏,吉拉斯修改《自由和所有权》一文,形成了《新阶级》的其余章节,《新阶级》最终完成。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吉拉斯因谴责南共在事件中支持苏联的政策,被判入狱 3 年。入狱之前,吉拉斯把《新阶级》的一部分手稿寄往美国;入狱后,他的妻子西菲卡(Štefica Djilas)将剩余部分偷运到美国。1957 年,《新阶级》一书在美国正式出版。

在《新阶级》一书中,吉拉斯猛烈攻击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权力—财产—新阶级公式”^①:苏东国家不是像这些国家的当权者所宣传的那样已经建立或者正在为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奋斗,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社会。在这个新的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就是从共产党内部异化出来的“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他指出,尽管在苏东国家,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已经建立,但实际上“真正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资源。”^②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就是对物质资料的使用、享受和分配”,因此,官僚的这种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就是所有权,而所有权正是判定阶级之所以为阶级的标准,“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兴起。”^③

“新阶级”的产生与以往阶级的产生有着很大的不同。先前的阶级“都是在新

① 黄宗良:《官僚特权阶层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国际政治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②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7, p. 35.

③ Ibid.

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而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偶然现象，而是东方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具体地说，两方面原因促成了“新阶级”的产生。从客观方面讲，近代以来，苏东这些落后国家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客观历史使命，而共产党由于在组织、理论等方面的优势，成为这一客观进程的推动者。在现代化过程中，集中全部社会资源，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些落后国家来说，成为加速工业化的必要手段，而这也是“新阶级”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既然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新阶级’除了增加它的残暴力量和掠夺人民之外再也不能做其他事了。”从主观方面讲，是斯大林一手缔造了新阶级，“斯大林的热月党式的苏维埃革命不仅导致一个比以往政府更专制的政府的建立，而且导致了一个新阶级的建立”，“他把自己置于这个正在诞生的新权力——新阶级、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最高处，成为他的领袖和组织者”。同时，列宁对“新阶级”的产生也难辞其咎，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使苏东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民主的内容；是他一手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而正是这个党的领导核心最终蜕变成了“新阶级”。“新阶级”一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革命或夺权阶段，“社会主义”或该制度的建立阶段，“法治”或制度的稳定阶段。这三个阶段与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去世后的集体领导时期相对应。^①

“新阶级”主要从三个方面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在政治领域，苏东国家成了“党的国家”，党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国家的公共活动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远没有有关政府和人民间的实际和不成文的规则重要。“新阶级”便是通过控制党，再通过党控制的国家机器来维护其统治的。在经济领域，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是苏东国家官僚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重要手段，“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垄断全部或几乎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结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须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无法找寻另一更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本身也就成了共产党政权本身蜕变的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新阶级”实行思想的专制。“新阶级”把自己的信仰解释为社会发展的普适理论，并通过国家机器把这种思想灌输到整个社会，最

①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pp. 41—54, 168.

终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的歧视,一方面以禁止其他不同的思想为目的;另一方面,以把自己的思想武断地强加于人为目的。这两种形式都是最令人震惊的、难以置信的极权专制形式。”^①“新阶级”这三个特征归结到一点就是其本质——权力,“权力既是共产党人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用以维持其各种特权和所有权,但由于这种权力与所有权都是特殊形式,只有凭借权力才能行使所有权。权力本身即作为一种目的,也是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②

《新阶级》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短短半年内仅在美国就重印了 10 次,“新阶级”成了西方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名词。^③ 吉拉斯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

五、超越“新阶级”思想

失去了官位的吉拉斯,继续用笔与他所认为的罪恶战斗。他在后半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没有正义的国度》(1958)、《与斯大林的谈话》(1962)、《黑山》(1962)、《麻风病患者及其他故事》(1964)、《恩杰戈斯》(1966)、《不完美的社会》(1969)、《石头和子弹》(1971)、《颜色的背后》(1971)、《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73)、《生活时光》(1975)、《战争年代》(1977)、《铁托内幕的故事》(1980)、《牢狱与理想》(1986)、《浮沉》(1986)、《新阶级的崩溃》(1998)以及大量的时评、政治论文等。这些作品既包括个人回忆录,小说、诗歌,也包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反思。其中,从政治思想的发展方面看,《不完美的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完美的社会》的副标题“超越新阶级”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吉拉斯创作这本著作的目的。在书中,吉拉斯试图超越他在《新阶级》中的观点,更详细、更深入地分析了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

在意识形态方面,共产主义已经是“意识形态的黄昏”。虽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但是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专制。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却被一步步地教条化,成为一种禁锢人类思想的意识形态。吉拉斯称恩格斯是将马克思的思想教条化的第一人,“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紧接着是列宁,“由于劳动者并不一定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理论的工具;最后是斯大

^①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pp. 70—146.

^② Ibid., p. 169.

^③ Serge Schmemmann, “Milovan Djilas, Yugoslav Critic of Communism, Dies at 83”,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1995, p. 7.

林,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控制人类思想的“专制武器”。^① 吉拉斯指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不复存在,“新的思想将从意识形态的废墟中成长出来”。“共产主义不但没有成为一种宗教,一种‘科学’的宗教;实际上,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它也已经解体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就是作为一国之内的垄断的意识形态来看它也已经解体了。未来的共产党将在最大限度上成为他们应然的样子:以他们自己国家的条件为基础,通过与其他政治团体合作,追求实现某种明确的社会和政府模式的社会政治运动。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② 吉拉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抱以极大的热情,认为它将把马克思主义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重新解放出来。

在经济领域,官僚控制下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将被真正的社会所有制代替。“给予现存所有权形式以更大自由和建立别的所有权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废除单独的政治集团的独占,废除用单一的党的路线来支配社会和经济”,形式上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样性的所有权形式”。^③ 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在吉拉斯看来,是基于工业化的自然进程的客观需要。工业技术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些“‘专门人才’——艺术家、工程师、教师、技师、经理人和技术官僚”,他们不信奉官僚的政治说教,“这个新阶层的成员大体上是不信奉政治说教的,甚至是反对政治说教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提高生活水平,改良技术和从事有益的事业”;然而,他们却是官僚维护其统治所不可缺少的,“党的官僚制度无法阻止这个新阶层的兴起,因为它是党官僚制度的存在所必需的。没有这个阶层提供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进步,官僚便不能维持其权力。”正因如此,面对这种所有权形式的变动,寄生的政治官僚除了从经典著作中找出个别词句来证明它的合理性之外,别无选择,“当因经济的要求,必须建立和发展私人企业时,只要那些新的企业主不威胁共产党人对政府的垄断”,“那些共产党人也不愁从他们取之不竭的教条武库中,找出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加以赞许”。

财产关系的变动必然会引起政治领域的变革,“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吉拉斯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共产党的专权的权力,因为“权力总是导致腐败”。“在政府之内或之外,存在着一个激烈的反对力量,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必要的。这种力量就算没有更大的作用,也可以使政府不至陷于停滞,使政府改正其错误,使政府做些应该做的事。”他呼吁民主,认为只有民主才是根治极权的唯一方法,“只有民主才能使共产主义摆脱恶性

① Cf., Milovan Djilas, *The Unperfect Society—Beyond the New Clas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9, pp. 93—106.

② Ibid., p. 40.

③ Ibid., pp. 198—207.

的循环,要改变共产主义只有遵循非暴力的方式。”

吉拉斯预言,苏东国家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将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的崩溃。为了证明他预见的正确性,吉拉斯密切关注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他对“布拉格之春”给予热情赞美,“捷克事件所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是专断思想的衰落,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以及其他思想将与马克思主义并存。”^①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大地上的伟大战斗失败了。但是没有理由绝望。真理和希望并没有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了世界的良心”,“布拉格之春”是“不灭的火种”。^②后来,他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极大的关注。他认为,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是否会产生一个“真正的新阶级”这方面很难预测,但是它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时期的冷酷的恐怖政策要好得多;它更有益于社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化”改革“可能要修改苏维埃制度;但是他的新观点都是产生于旧的新阶级等级制度。”^③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也最终解体了。1995 年 4 月 20 日,吉拉斯在贝尔格莱德病逝,他在去世之前见证了自己预言的实现。

今天看来,尽管吉拉斯对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有些言过其实,夹杂着强烈的个人感情,但是,苏东剧变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吉拉斯批判的合理性。从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到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露它的弊端,吉拉斯的思想发展既反映了在那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年代中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也反映了当时整个苏东国家的人民的思想变化——从热衷于建立苏联模式到最终抛弃它。不过,当苏东国家抛弃苏联模式时——吉拉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那样做了——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剧变之后,历史留给东欧人民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家园。正如吉拉斯自己所说,“新思想总是属于少数人”,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中最具敏锐眼光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的少数人,他们的“新思想”就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将现实的美与丑展示于公众,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幸事还是不幸呢?

① Cf., Milovan Djilas, *The Unperfect Society—Beyond the New Class*, p. 52.

② Milovan Djilas, “The Unquenchable Fires of Czechoslovakia”, *The Central European Federalist* (New York), December, 1968.

③ Conversation with C. L. Sulzberger, Yugoslavia, July 1985, in C. L. Sulzberger, *Paradise Regained: Memoir of a Rebel*, Praeger Publishers, 1989, p. 135.